

吴昌硕经济生活与“一月安东令”之辞考略^[1]

郑付忠 李德军

内容提要：吴昌硕是近代艺术史上开一代新风的大家，这个定位一度拔高了我们在其“捐官”“辞官”问题上的认识。文章围绕吴昌硕晚年的经济生活，结合晚清捐纳的世风及“士商观念”转型的社会背景，从经济因素层面分析了吴昌硕如何从负债捐官，到为完成“期在三年”的还债之诺而最终辞官“偷活海上”的历程。

关键词：吴昌硕 捐纳 辞官 经济生活

吴昌硕是近代艺术史上的巨擘，然目前学术界对他晚年捐官、辞官问题却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如赵润田便说：“他还有至少两次由亲友攒钱帮他‘捐官’，他也都没做好，糟蹋了银两。他不是不想做官，但他不是做官的料。”^[2]除此之外就是刘江先生关于“吴昌硕由于不善逢迎上司”^[3]而辞官的说法，流传最广。这些常见的误读均忽略了吴昌硕晚年的经济生活和晚清捐官成风的社会气候，把吴氏“积资劳至直隶州知州”^[4]的借银捐官想当然地理解为“亲友攒钱”，把辞官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不是做官的料”，是很不严肃的学术态度。读书做官历来是我国传统文人的 人生信仰，吴昌硕自然也不例外。他早年曾一度汲汲于功名，并考取了所谓“同治童生，咸丰秀才”^[5]。只缘功名太低，以至于后来走上了“捐官”的道路。1899年，他捐到了安东县令实缺，然仅仅月余便突然辞官，自此吴昌硕捐官、辞官便成为近代艺术史上一段热议的话题。现有资料对吴昌硕辞官的论述较多，而关于他在此前任职情况的记载则比较模糊，正如赖毓芝先生所说：“吴昌硕壮年时曾捐了个‘佐贰’的小官，但具体时间为何，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吴昌硕在1874年至1877年间，曾客于江苏道员署两淮盐运使杜文澜的曼陀罗馆，1880年至1881年在苏州知府吴云幕。然而其任小官的时间是否与上述两段时间重叠，却不得而知。”^[6]与之相近，《吴昌硕年谱》则在1873年下注：“因未载何年任此，姑列于是年。任佐贰或后于是年。”^[7]而刘江先生则称，1882年

[1] 本文系2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七世纪以来文人情结与书画商业文化博弈研究”（编号：16YJC760078）阶段性成果。

[2]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3]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15页。

[4] 《吴昌硕》，西泠印社1993年版，第25页。

[5] 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西泠印社1995年版，第8页。

[6] 赖毓芝：《肖像、形象与艺业：以吴昌硕上任伯年所订制肖像画为例的个案研究》，澳门艺术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论丛——像应神全：明清人物肖像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409页。

[7] 林树中编：《吴昌硕年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吴昌硕把分居十年的妻儿接到苏州，然鬻艺惨淡，一家四口生活艰难，经朋友介绍去做了个“佐贰”^[1]，《安吉县志》也采用了这种说法^[2]。佐贰是个什么差事呢？据《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载：“明、清时凡知府、知州、知县的辅佐官，例如通判、州同、县丞等。品级略低于正官，但非纯粹属官。”^[3]换言之，吴昌硕在做县令以前起码做了十几年的佐杂。^[4]

吴昌硕早年一直想博取功名，他在38岁所作的《别芜园》中说：“读书愧未成，好古竟何取？男儿好身手，何不拔剑舞？区区谋一饱，坐受众人侮。”^[5]表达了他不甘落寞的人生志趣。直至41岁时他还治印“十里园丁，五湖印丐”^[6]，发出了对做家塾和刻印为生的感慨。在吴昌硕捐官、辞官的问题上，现代不少研究者有意回避这个话题，有过度阐释之嫌。吴昌硕二十几岁时便辗转苏州、杭州、湖州、上海等地，到处寻师拜友，攀附名流。其间结识了福建盐运使陆心源、苏州名家杨岷、苏州知府吴云、海派巨擘任伯年、湖南巡抚吴大澂等人^[7]，并借由在陆心源家任司账的机会，结识了丁葆元、施补华、凌霞等“湖州六才子”。另，1879年吴昌硕自治印集《篆云轩印存》，也成为他攀附名流、干谒朱紫的社交“名片”。他早年曾携印册至杭州拜访俞樾，深得赞许，并在俞的推荐下结识了不少艺苑名流及在朝官员，如俞樾的门生、工部尚书潘祖荫。^[8]不仅如此，1895年，年逾五十的吴昌硕还曾携印谱、诗集拜谒过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9]此外，他还多次托人向张之洞幕府总文案、“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郑孝胥呈送诗文、印集。^[10]令人生愧的是，他此时艺名尚不甚隆，仕途依旧无望，仍在为一家生计和个人前途而辛勤奔波。

在吴昌硕看来，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无疑是一个重要契机。吴大澂受命帅军北上抵御日军，招纳吴昌硕做了高级幕僚^[11]。吴昌硕对此次行动充满期待，入幕前他特意托人向吴大澂献“度辽将军”铜印，吴大澂认为大吉，不曾想仅数月之后便溃败而归，其功名之念也成为泡影，于是他开始谋划捐官一事。由安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的《吴昌硕》是这样说的：“为了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才有他狠下心来，用多年积蓄以捐官之事。”据说捐候补知县的保举人正是吴大澂。而吴昌硕之所以要用多年积蓄捐个候补虚职，无非是想做知县罢了。我们不清楚吴昌硕在做候补知县以前的

[1]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2] 安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

[3] 张政娘：《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0页。

[4] 按，据侯开嘉先生考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至戊戌变法以前”吴昌硕捐到了候补县令。本文并不确定与以往学者所谓的“佐贰”是否系异名同指。见侯开嘉：《关于吴昌硕六十岁前后变法种种》，《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431页。

[5] 吴昌硕：《吴昌硕诗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6]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编：《吴昌硕篆刻砚铭精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7] 王季平：《吴昌硕与湖州》，沈阳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8] 徐建新、朱炜编：《俞樾与湖州》，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9] 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2721页。

[10] 郑孝胥撰，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5页。

[11] 王琪森：《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评传》，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具体任职情况，但从他1888年请任伯年所画的《寒酸尉像》来看，显然他并不甘心做个唯唯诺诺的“佐贰”。图中吴昌硕端立拱手，厥状可哂。他自题道：

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呼乃敢入，心气先慑沮。周言见何事，欲答防龃齬。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伛偻。朝食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要脚苦酸楚。山阴予任子，腕力鼎可举。楮墨传意态，笔下有千古。写此欲奚为，怜我宦情苦。我昔秀才时，食贫未敢吐。破绽儒衣冠，读书守环堵。愿言窃微禄，奉母有酒脯。铜符不系肘，虚秩竟何补。^[1]

对于这则题跋，由海门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海门县文史资料》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说吴氏“在诗中经常嘲讽那些‘貂帽狐裘’客，对官吏持一种藐视的态度”^[2]。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作为地方文史部门对吴昌硕文人秉性的嘉许，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需要强调的是，此并非吴昌硕本意，至少不是“寒酸尉像”所要表达的核心旨意。该画像中吴昌硕谨小慎微、唯恐有失的小吏形象在当时官场中确实十分典型，吴氏早年为仕途升迁和艺名传播没少结交名流、逢迎权贵，自然少不了察人眼色、卑躬屈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寒酸尉像”并非毫无依据的艺术夸张，问题在于吴昌硕为什么非但不避讳反而要有意示众呢？另，晚清小吏的典型特征是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则巧取豪夺^[3]，以至于曾国藩都感叹道：“堂上一点朱，民间万点血也。”^[4]那么吴昌硕作为官场底层的“寒酸尉”，是否真的如他所说那般唯唯诺诺、慎言慎行呢？这不禁让人心生疑窦。更为重要的是，捐官动辄需银数千两，吴氏作为一个小小的“寒酸尉”，靠鬻艺勉强为生，又怎能筹措得起来？即便能借到，他又如何偿还？这些都是很难经得起拷问的。由此我们认为，一、以往学者对“寒酸尉”形象的解读太过片面，至少这个群体并非如吴昌硕字面传达的那样卑微。二、吴氏身处黑暗腐败的晚清，存在利用官场陋俗渔利的可能——至少借钱给他的捐银者有这种心理预期。三、吴氏在做“寒酸尉”期间一直没忘结交海上、苏杭等地的书画大家和社会名流，不排除他利用政治身份进行市场炒作的可能。吴昌硕想通过“寒酸尉像”塑造一种看似无意于仕进的文人形象，而这实际上又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口碑，这种情况早在清中期扬州八怪那里就十分常见了，到了清末民初的海上艺坛，更是见怪不怪。这一点后面再展开，我们先回到吴昌硕捐官的问题上。

“寒酸尉”形象的阐释关系到对吴昌硕捐官心态的解读，也牵涉到后面“一月安东令”的辞官问题，因此笔者不烦赘述，先来交代一下晚清捐官的社会风气。众所周知，晚清社会内忧外患，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政府为聚敛钱财大肆卖官鬻爵，“捐官”之风泛滥，造成低级官更多如牛毛，

[1] 侯开嘉：《关于吴昌硕六十岁前后变法种种》，《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82页。

[2] 海门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门县文史资料》第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3] 按，通常人们认为“寒酸尉”正是底层胥吏的真实写照，实际并非如此。如晚清官员尹耕云在其《胥吏论》中便尖锐地指出他们祸国的一面：“有胥吏，则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帑藏可侵可渔，处分可轻可重，铨选可疾可滞，人才可升可降。久之，而人命无所偿，则冤讎固结矣；讼狱无所决，则控诉日滋矣；盗贼无所惩，则劫夺公行矣；帑藏无所赢，则灾荒鲜备矣；处分不一，则规避开矣；铨选不公，则除授滥矣。”见（清）尹耕云：《胥吏论》，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吏政十一吏胥。

[4] （清）曾国藩：《直隶清讼事宜十条》，《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4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77页。

中下层候补官员呈“金字塔”式增多。^[1]以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例，江苏各项候补府厅县多达千人，候补佐贰杂职更不啻两千。而据1899年《清会典》统计，当年可供递补的官缺全国只有32个一级州同、35个二级州判、345个县丞，55个主簿。^[2]由此造成候补者十几年都难等到实缺，有时得到临时委任，也维时较短，频繁更替，若再想得到机会又“属茫茫无期”^[3]。如赵之谦曾捐了个江西知县，候补多年也未补上实缺，于是自题书斋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榷斋”^[4]，从中不难体会候补者的苦楚。所以要想在捐官游戏中脱颖而出，金钱是首要条件。然而候补人群中“为贫而仕”者占据了多半，据欧阳昱《见闻琐录》载：“予在署中，见佐杂上衙门时，面多瘦而黄，头多俯而下，帽靴多十年前物，袍褂多三十年前物。……住一破屋中，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衣破单衣，饿已两日。”^[5]吴昌硕就是众多落魄者中的一员，急需通过升迁摆脱生计潦倒的局面，所以对于吴氏而言，“能够‘过班’捐升为品级较高的知县，出路较宽，情况也许会好些，这或者便是吴昌硕有志筹款捐升知县的原因了。”^[6]尽管尚无太多材料指证吴昌硕捐官的经济动机，但他显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吴氏拿出多年积蓄捐“直隶州知州”，而此时一家四口全仰仗他一支笔杆，如果说其捐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光耀门庭或救民于水火，岂不滑稽！所以“寒酸尉”形象中不仅有对仕途命运的调侃，更不乏对由仕途乖舛而连带造成的生活拮据的感慨。

诚然，对于读书人而言，捐官首先是为了博取功名。道咸以来，捐例广开，捐官者所占比例日益高涨，读书科考者无不“以错过机会为虑，皇皇然，不辞措资急求进身”^[7]。吴昌硕自然也不例外，这个情结可以从他写给吴彦复请求借银加捐知县的信中获悉：

弟碌碌无可短长，以酸寒尉终身，即亦已矣。乃不自知其酸寒，而人视之者代为酸寒，二三知己竭力怂恿，劝以加捐县令。盖知弟捐有县丞，且乐为之助，现集款已至千五百之谱。查县丞捐升知县，须实银二千五百余两。刻托徐子静观察，由厦门炮台捐上兑，再打八三折，只须实银二千两有奇，……可否慨借朱提，数唯四百，计完赵璧，期在三年。倘蒙允我，敬乞五月中旬赐汇沪寓。因急上兑，局促如是。^[8]

吴彦复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儿子，晚清四公子之一，好收藏，也是吴昌硕篆刻的一个重要收藏者。前述提及吴昌硕通过他转呈印谱、诗集给郑孝胥，想来素有交情，不然也不至于开口向其借钱。信中吴昌硕又拿自己寒酸尉的身份调侃，并以此向吴彦复借钱。捐县令需要多少钱呢？信

[1] 按，1874年，晚清官僚朱采说：“各省大小候补通以千计，合之各部曹则二万矣。”（清）朱采：《海防议》，《清芬阁集》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8辑，第131页。

[2] （清）昆冈等续修：《清会典》卷5，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第1页。

[3] 引自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85页。

[4] 引自李乔：《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23页。

[5] （清）欧阳昱：《见闻琐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50页。

[6] 苏同炳：《长河拾贝·“寒酸尉”吴昌硕》，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7] 阙名：《论起复废员亦市推广捐例之一法》，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之四，《吏治》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9辑，文海出版社，第299页。

[8] 《吴昌硕与寒酸尉》，收录于沈尹默等：《中华艺林丛论》册二，文馨出版社1976年版，第791页。

中说“二千两有奇”，其实所需远不止此数。要想在众多的候补者中争取到实缺的机会，除了捐银外，还需要有得力的人引荐以及可靠的信息渠道，而这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载，光绪年间浙江某候补知县按例当补某缺，却被胥吏索要五千金作为情报费，此事终因拿不出贿银而作罢。^[1]吴昌硕有没有花钱打探署缺信息呢？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不排除这种可能。至于最后捐到安东令，一般的说法是“得同里丁葆元保举”^[2]。“保举”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康熙年间因捐纳中出现了“假冒顶替情弊”^[3]，所以规定报捐者要出具同乡京官签署的保证书，即所谓“印结”。很多捐纳人没有在京“同乡”官员，则只能花钱请中介商人代办，由此也会产生一大笔额外费用。所以晚清又滋生了另一丑恶现象，即代办印结时的欺诈行为，《官场现形记》中便有举人赵温为“找同乡，出印结”而被欺骗的情结^[4]，足见此风在晚清的蔓延。虽然与丁葆元同在扬州盐运署，吴昌硕与丁氏有没有深交，会不会也有类似出具印结一样的保举费，这些都不得而知。然按照刘江先生的说法，吴昌硕赴任安东令倒是委曲求全：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末，扬州盐运署分到了一个安东县令缺额，因为安东县小，油水不多，盐运署里大家都不肯去，署中有个运司名叫丁葆元，也是湖州人，便保举吴昌硕去。吴原无意仕进，但痛恶盐署时弊无耻，又为了“奉母有酒脯”，也就答应去了。^[5]

吴昌硕显然不是“无意仕进”，这从他致吴彦复的信中不难看出，这里有过度阐释之嫌。但安东作为苏北的一个小县城，地贫土瘠，常年水患，油水不多，且盗匪猖獗、治安极差，应该没有达到吴昌硕捐官的预期，倒是实情。关于吴昌硕赴任的原因，他自称是为了“奉母有酒脯”，这个说法太过矫情。也有研究者称吴氏因米芾曾就任于此，于是文人相惜便匆匆赴任了。从他上任后下令修缮“米公洗墨池”来看^[6]，似乎也有点关联。然笔者以为这都是表象，须知这个县令可是花费数千两银子买来的。吴昌硕赴任安东令一则是他功名心切的表现；二则他欠下大笔捐债，不得不上任（当然，这也为其辞官埋了下伏笔）。另，侯开嘉在论述吴昌硕捐官动机时说：“当时由候补官到实缺官是极不易之事，因此，吴昌硕去当安东县令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更不是王个簪先生所说的‘为生计所迫’，他是本着儒家入世济世的愿望去当这个县令的。”^[7]侯先生也只说对了一半。吴昌硕倾其所有捐个县令，当然不排除“入世济世”的目的，然而当做官不能解决起码的生计问题时，一个背负着数千银两债务的文人还有心思胸怀天下，岂非咄咄怪事！不管怎么说，吴昌硕到底是赴任了，令人不解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他便辞官了。对于他匆匆辞官的原因，研究者众说纷纭，相比之下刘江先生的说法影响较大，被征引也最多：

[1] （清）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部吏索贿于某令》，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58页。

[2]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2页。

[3] （清）陆海编：《本朝则例类编·吏部》卷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第10b—11a页。

[4] （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21页。

[5]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15页。

[6] 马超骏、程杰编：《淮安古迹名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7]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吴昌硕由于不善逢迎上司，也不惯于官场应酬和那种繁杂的升堂理政等公务，“安东多盗号难治”、“弦歌不足三径资”，收入难以糊口，加之重听、臂痛加剧，身体难以适应，只得辞去县令一职了。^[1]

其他有关吴昌硕辞官原因的论述大体不出以上分析，或稍有延伸。如吴民光便称吴昌硕“因不惯逢迎长官，鞭撻百姓”而辞官^[2]，而洪丕谟则说吴昌硕辞官是“对清末统治者所采取的那种公然不合作的态度”^[3]。按，关于吴昌硕“不善逢迎长官”的问题，显然忽略了他任县令前的“寒酸尉”生涯，所以侯开嘉先生说：“当了多年佐贰小吏的吴昌硕都从未辞官，如今当了县令反而辞官，其理由显然是牵强的。”^[4]另外，侯文又以“比吴昌硕略早的魏源和同时的赵之谦”做县令为例，一并否定了关于“鞭撻百姓”的辞官因由^[5]。最经不住推敲的是洪丕谟，吴昌硕做喋喋小吏多年，负债累累去捐官，这本身就是对晚清统治的屈从，何以“一月安东令”便“公然不合作”了呢？所以侯开嘉称：“吴昌硕不具备如此胆识，也没有这种政治觉悟。”^[6]而对于吴昌硕辞官的原因，侯文指出与安东寒冷的气候和别人对于捐官的“冷言冷语”有关^[7]。今按，吴昌硕前半生穷困潦倒，好容易借巨款捐了县令，岂能因为气候原因而轻言退却？倒是世人对捐纳官员的议论，的确是存在的。就在吴昌硕捐官前的1894年，谭嗣同也通过捐纳成为候补知府，两年后他抵达南京赴任。旁人对其捐纳身份的议论，使他“每引以为大耻”^[8]。他向别人请教学问时，对方皆因其捐官背景避而不见，此事对谭嗣同刺激很大，一年后便辞官归湘，且常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9]。以此观之，则吴昌硕辞官似乎真的与其捐纳出身有关。笔者以为，不排除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这绝非最根本的原因。另，尽管都是捐纳出身，吴昌硕和谭嗣同辞官决然不同。谭氏早年阅读大量西方书籍，主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他辞官后便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与诸同志谋欲以湖南一省倡导新政”^[10]。相比之下，吴昌硕的思想便显得守旧，他千方百计捐官，至死功名之心未泯，因此辞官对于吴氏而言是心理上的一个巨大挑战。此外，尽管都有出仕之心，吴昌硕对仕途的期待不仅限于做官，他还要偿还纳捐债务，维持一家生计。谭嗣同则不同，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封疆大吏，在经济上远胜于吴昌硕，所以谭可以因别人对“异途”的白眼而辞官，吴却不能。

对于辞官的原因，侯开嘉还指出吴昌硕“缺乏吏才”，说他在任安东县令之前“只是在县衙当差或为幕僚，从未当过主持工作的县令。”^[11]吴昌硕是否缺乏吏才呢？是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不

[1]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15页。

[2] 张政娘：《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第168页。

[3] 洪丕谟：《吴昌硕的〈缶庐集〉》，《西泠艺丛》1984年第9期。

[4]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5]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6]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7]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8] 引自贾维：《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10] （清）谭继洵撰，贾维、谭志宏编：《谭继洵集》下，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719页。

[11]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否认。辞官十年后，他在看到赵之谦当年《断万氏争葬地朱判》后自愧不如，称赞赵氏“风流文采余，心细能折狱”，同时检讨自己的县令生涯说：“予昔令安东，疏懒乏教育，听断无可传，但愧窃微禄。”^[1]从他上任后的种种表现来看，这并非自谦。据《涟水文史资料》载，吴氏上任后既不拜谒知府也不联络同僚，而是整日吟诗作画，刻印玩石。淮安知府以挖井劳民伤财为由向他兴师问罪，他却以“城里东西两澳水太咸，黄河水又太浑，不能用来磨墨”作答，虽然他上任后也“重新审理了两桩冤案，一时反响很大”，但却褒贬不一。^[2]则其吏才拙劣，由此可见一斑。然作为一个文人，吴昌硕一生指仗砚田，拙于吏才，本无可厚非。况且“拙于吏才”者绝非吴昌硕一人，文人做官多以诗词文墨见称，有几人善于案牍狱讼？多半委托幕僚、胥吏罢了，这在晚清是极为普遍的。时人董文焕在《请飭臣工讲求律令疏》中说：

今士子读书应试，以至登第，皆以制艺诗赋分厥高下，而于吏治法律诸书，则固无暇深究。及释褐登仕，所用皆非所学，既不屑究心庸下者，又苦其难读。至躬亲案牍，茫然无主见，跋前疐后，在在不免，势不能不委诸胥吏。^[3]

吏治诉讼本非圣人之学，儒者不屑为之因而托诸胥吏，这在晚清官衙可谓司空见惯。即便京师衙门也不例外，据徐珂《清稗类钞》载：“各部司官，不习吏事，堂官无论已，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4]地方衙门情况就更糟糕了，据晚清安东县举人鲁一同载：“今自县令以下，若丞、若簿、若尉者，事何事乎？催科问胥吏，刑狱问胥吏，盗贼问胥吏，今且仓监、驿递皆问胥吏矣。”^[5]鲁一同略早于吴昌硕，到了吴任安东令的光绪年间，官不亲事，托诸幕友、胥吏的情况更甚。尽管这是一种官场丑恶现象，但不得不说它是“官有升迁，吏无更换”^[6]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吴昌硕是否具备吏才皆不会影响到他做县令，我们不能为了拔高吴氏而过度阐释。

二

说回到前述吴昌硕向吴彦复借款的书信，从信中语气看，他捐官尤为迫切，且身负几千两捐银债务的吴昌硕竟承诺“期在三年”偿还，这对于一个处于温饱水平线上的“寒酸尉”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尽管他其间还鬻艺补贴生活，然他捐县丞时“鬻艺生涯清淡，不足以贍一家生计”。^[7]（下面还会谈及，在捐县令的1899年，吴昌硕的账目显示他平均月收入也不过几十元）对于这样一个“寒酸尉”，他哪里来的勇气保证三年“计完赵璧”呢？这再次让我们对吴昌硕捐官的动机产生了质疑，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他相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又得说回到晚

[1] 见侯开嘉：《关于吴昌硕六十岁前后变法种种》，《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109页。

[2] 涟水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涟水文史资料》第1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2页。

[3] 引自张仁善：《清末官僚法律心理的演变与传统礼法制度的消亡》，《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第34页。

[4] （清）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第11册，总第5249页。

[5] 鲁一同：《胥吏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5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6页。

[6] 郑观应：《书吏》，《盛世危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7] 吴长邨：《我的祖父吴昌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清捐官的社会风气上。所谓“捐官做，买马骑”，捐纳成为晚清官吏选拔的重要途径^[1]，也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官场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官俸极低。县官的待遇是多少呢？据成书于1899年的《大清会典事例》载：“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2]这点俸禄对于一个县官而言可谓寒酸，所以清代为了应对官员贪腐推出了数额可观的养廉银制度^[3]。但问题仍旧存在，一方面养廉银很难持续落实，另一方面养廉银的发放主要针对高官，底层官员微乎其微。吴昌硕在捐县令前的十几年一直人轻位卑，这个群体大部分没有正式编制，所以“只有少数胥吏头目有俸禄和养廉银，普通吏员仅有工食银。吏员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陋规，即应差办案的各项收费”^[4]。吴昌硕在此期间是否有依靠陋俗或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尚无直接证据，然他不可能有太多职务收入确是实情。除此之外，他主要靠卖字刻印积攒些银两，所以才会有为“加捐县令”而多方借钱的情节。从吴昌硕向吴彦复承诺“计完赵璧，期在三年”来看，他对做县令的经济收入是有很高预期的。这当然不是非要给他扣个“贪官”的帽子。实际上由于晚清官俸极少，贪腐或陋俗收入俨然成了官场见怪不怪的潜规则，正如时人冯桂芬所说：“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5]当代学者在研究清代捐纳制度时也指出：“他们用钱捐到官，自然不仅要收回成本还要赚大钱。”^[6]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说的正是这个风气。光绪年间一个“要钱不要脸”的笑话广为流传。说的是两个书生在路上看到一文钱，都想据为己有，争执不下只好告到县衙。结果钱却被县官抢了去，并说：“我‘千里来当官，为的捞吃穿。要钱不要脸，我要这文钱’。”^[7]这则趣闻真实地反映了晚清捐纳者的心态。随着晚清捐例大开，不少人见有利可图，甚至把捐官看成了做生意赚钱的买卖，出现了合伙捐纳、得钱按资分配的丑恶现象。据《清稗类钞》载：

自捐例开而游手好闲之徒，大率以官为市，越人为最多。官之岁入，县令尤巨，年得数千金者为瘠缺矣，然视他项商业，则独赢。腴者多至十万，亦仅就钱粮漕米之平余计之耳，若不恤人言，遇事纳贿，则可至数十万。……山阴蒋渊如涎其利久矣，而苦于捐资之钜也，乃与其有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谋之，醵资上捐，得最新花样最优班次之候选知县。……岁入多金之事，皆资者得之，而职权有高下，收入有多寡，即按出资之大小以定之。协商就绪，盟于神，歃血为誓，无间言。越数月，得某邑，腴缺也。盖乘郑工捐例之第一卯而出贄上兑，故捷足先得焉。……岁可二十余万两。^[8]

[1] 按，据统计光绪年间捐纳官员的人数高达2674人，占比59.45%。参见燕红忠、卫辛：《晚清捐官、政治取向与辛亥革命》，《财经研究》2017年第10期，第122—133页。

[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9，户部98，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光绪二十五年（1899）原刻本。

[3] “养廉银”即“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见《皇清奏议》卷23，李发甲：《澄清吏治疏》。

[4] 熊月之：《略论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第40—49页。

[5] （清）冯桂芬：《省则例议》，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吏政七》。

[6] 李满星：《捐纳为官的清朝“官二代”》，《文史天地》2013年第10期，第31—34页。

[7] 引自谷宇：《资本积累与权威竞争》，《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体系内的制度博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138页。

[8]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第1358—1359页。

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所以成为捐纳的重灾区。山阴人蒋渊如与其友四人集资捐官，最终得“最优班次之候选知县”，即所谓“腴缺”，这是捐官游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所以得到了年收入“二十余万两”的回报。吴昌硕为何敢于借贷捐官并承诺三年归还，从这则材料我们不难得到答案。可惜吴氏运气不佳，被保举做了安东县令，按照《清稗类钞》的说法，即所谓“瘠缺矣”，因此亲友劝他不要赴任。然即便是安东县这样的“瘠缺”，在当时人看来“年得数千金”应该不成问题，想必吴昌硕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下赴任的。他对做官有收入期待不足为奇，清中期郑板桥任县令期间也曾鬻艺谋生，收入颇丰。据郑氏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中说：“我每年笔润，就最近十年平均计算，最少年有三千金，则总数已有三万。”^[1]郑板桥鬻艺在艺林传为佳话，人尽皆知，吴昌硕想必也是了解的。另，清末官员何刚德在民国时曾说：“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2]由于晚清内忧外患，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俸禄少且不能如数发放，官俸微薄在某种程度上也扭曲了为官者的价值观。不少捐纳官员穷困潦倒，特别是那些候补官，捐官花费颇巨不说，做了官还需维持官场的体面，用度惊人。若像吴昌硕一样，只是个候补佐杂，想争取到官缺实属不易。即便借款、跑关系捐到实缺，也是收入微薄，难以养家。所以捐纳官员一旦得到差缺，无不挖空心思捞回本钱。据晚清官员朱采《海防议》载：“一差而数十人争之，一缺而数百人候之。其未得差与缺，与受代以后之日用悉取资于差与缺。”^[3]虽然安东县贫瘠，吴昌硕毕竟是得到了实缺。而捐纳体制旨在敛财，造成晚清时期大量候补者常年积累不得委署，偶有临时委任，则无不大肆贪匿，收回捐银。正如《申报》1875年《论整顿吏治须先厚给俸禄事》一文所言：“夫以年余之委署，当筹前后十余年之食用，难乎其难。故秉公者，日形其窘迫，几有束手待毙之虞，而营私者，日见其充盈，反有心广体胖之荣，人又何为秉公而不私也？”^[4]用金钱换来了乌纱帽自然要加倍收回，这似乎顺理成章了。需要强调的是，大部分的捐纳者和吴昌硕一样，并非十分富有，他们捐官带有极强的利益诉求。据清人欧阳昱《见闻琐录》载，同光年间不少候补州县“贫到饭食不给，饿死在旦夕，不得已借重债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计。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以此为赌也。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议署事时为账房师爷，……账房出息，或平分，或三七分，或全归师爷。彼时急于得银，唯命是听”^[5]。“赌子”借钱自然也是利字当头的，捐纳人反而成了赚钱的工具。在这样的风气下，借钱捐官要不要搜刮民脂民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由此联想到吴昌硕的三年之诺，个中滋味不言自明。当然，借钱捐官风险很大，《见闻琐录》还记载了不少捐纳者筹钱报捐，结果血本无归，无颜“再告贷”的情况：

最苦州县佐杂耳，……罄家资数千金以捐之，不顾其余。至佐杂中，……多下户读书未成之人与游幕无业之辈，邀亲友敛银二三四百两。捐此职到省，初皆谓可获数倍利以归，及至需

[1] （清）郑板桥著，木子译注：《板桥家书》，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1页。

[2]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1，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页。

[3] 《清芬阁集》卷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第131页。

[4] 《申报》1875年12月25日。

[5] （清）欧阳昱：《见闻琐录》，第48页。

次已久，资用乏缺，罄家产者无从接济，邀亲友者无颜再告贷，典质俱尽，坐以待毙^[1]。

这些记录晚清官场捐纳的材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结合吴昌硕写给吴彦复的借款信，尽管吴昌硕并未交代他先行筹措的“千五百之谱”是否有“赌子”的高利贷，抑或是“邀亲友敛银”，但从其“因急上兑，局促如是”的语气来看，这笔捐银筹措得并不容易。正如《申报》1875年所刊《书两淮运宪考试人员后》一文所说：“夫候补人员其能家有接济，不事借贷者，一省能有几人？其余非当卖买活，即借贷度日，甚焉者，即印子钱，犯帐，亦敢借用，挺而走险，急何能择？但求救目前之死，速暇计日后之累哉。”^[2]不把捐官当成“卖买活”，就得“借贷度日”，以当时吴昌硕的整体处境来看，不排除向“赌子”借贷或用了“印子钱”的可能。如此则捐官成了下赌注，其目的无非两个，在官则言光宗耀祖，在商则称盆满钵满。欧阳昱所谓“初皆谓可获数倍利以归”的说法，道出了捐纳者普遍的心理诉求。如果此论成立的话，则吴昌硕“期在三年”的还款之约便有了合理的解释。只可惜由于安东县民贫地瘠，“油水不多”，上任月余便让吴昌硕觉得还款无望，所以才有“一月安东令”之辞。作为文人，捐官者当然想名利双收，而一旦现实落空，则只好自食苦果，挂印而去。辞官后的吴昌硕欠下大笔捐债，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他年近古稀又移居上海鬻艺了。

三

笔者之所以把经济因素视作吴昌硕捐官、辞官的根本原因，除了考虑到当时官场的捐纳之风外，还与晚清士商观念的转型有关。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商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士人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新的社会风气洗礼，传统士商观念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得到了极大转变，政治理想不再是文人唯一的人生追求，鬻艺自谋、“实业兴邦”的社会舆论已经形成。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牟敌利。”^[3]就连鲁迅先生也要言不烦地阐扬美术经济的作用，他在《美术之目的与致用》中说：“美术可以救援经济。”又说：“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尔后金资，不虞外溢。”^[4]士商观念的转型还可以从当时《申报》一篇名为《论考验艺徒》的文章中看出端倪：“人生世上，厥有四民，士居其一，农工商居其三，……通一事即可得一事之用，执一业即可得一业之力，业虽有大小之分，而其所以谋食则一也。”^[5]文章从谋生的角度出发，认为士农工商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向读书至上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这体现了晚清商业文化抬头和士商观念的实用化趋向，“羞于言利”不再是文人思想上的一个紧箍咒。吴昌硕“一月安东令”之辞正处于晚清士商观念转型的大背景下，“当时在苏州、上海以鬻画为生的达官贵人、文化巨子、艺术家比比皆是，职业艺术家身份已经慢

[1] （清）欧阳昱：《见闻琐录》，第47页。

[2] 《申报》1875年5月8日。

[3] 康有为著，乔继堂编：《康有为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页。

[4] 鲁迅：《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页。

[5] 《申报》1881年8月28日。

慢地摆脱了传统观念的牵绊。”^[1]尽管吴昌硕对仕途尚不能完全释然，但商业文化对士人观念的冲击无疑助推了他的辞官之举。

从现实的角度看，吴昌硕长期以授馆和游幕为生，生活拮据，平素靠笔耕墨耘补贴生活，勉强度日。前面谈及他捐官时借有大量外债，接手安东令这个“瘠缺”后各项收入又令他大失所望，于是挂印而去。吴昌硕辞官的当年，其鬻艺收入几何呢？据《吴昌硕翰墨珍品》刊出的一份1899年的笔录显示，吴昌硕从该年“正月十日”到“五月廿九日”五个月内，月收入从几元到数百元不等。^[2]不知这是否是他全部的账目，尽管收入不稳定，但平均每月三五十元，即便是在繁华的上海也能基本维持一家老小生计。^[3]而此时正值国家危亡时期，官俸微薄且很难发放，“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不能见光的收入来弥补俸禄，不然也就只是得个名而已。”^[4]当官对于吴昌硕而言只是空有名头，而安东距离上海近千里，吴昌硕既无职业收入，又远离他经营多年的苏杭、海上等鬻艺市场，加之捐官欠下“实银两千有奇”的债务压力，因此突然辞去县令一职也就不难理解了。辞官后他奔走于苏杭、上海之间，直到1911年寓沪，正与其“一月安东令”之辞相呼应。这里还要交代一个细节，据侯开嘉先生考证，1899年吴昌硕所谓的辞官实际上是“请假”^[5]。他急着“请假”所为何事呢？这在他次年写给朋友沈石友的信中有透露：“弟二月已至上海，因清江来电，索弟即返。”^[6]可知吴昌硕“请假”去了上海，这边官场的事情还没了结，他便急着去海上鬻艺谋钱了。另，前述他致吴彦复信中有“敬乞五月中旬赐汇沪寓”，知其在捐官前便常驻留海上，所以吴昌硕并非那种为了官帽而置生存于不顾的迂腐之人。晚清时期，海上鬻艺成风，不少名家巨擘皆来此谋食。吴昌硕急着离任赴沪，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还债自谋。如此看来，他最终定居海上绝非一时兴起，一方面作为鬻艺谋生者他早生此念，所以从1880年起便与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吴鞠潭等上海艺坛名家频繁交游。原因很简单，只要看一下海派书画润例后动辄数十人、几十人代为介绍的情况，就明白吴昌硕这样做的动机了。另一方面，具体到1899年，则官场收入的微薄及沉重的债务压力也迫使他最终定居上海。

吴昌硕早年便经常到上海，并结识了任伯年、王一亭等海上名家，工商大亨王一亭还多次邀请他寓沪鬻艺，鼓励他不必担心生计问题。但吴昌硕最终在1899年选择了赴任安东令，或许是功名之心未泯，又或者是对鬻艺海上的不确定性使然。辞官后的吴昌硕只能背水一战，他曾派弟子赵子云先去上海探路，最后终于于1911年夏定居海上。^[7]历史证明，吴昌硕的上海之迁是正确的。然而晚

[1] 洪权：《弃官鬻艺——从吴昌硕笔润收入的变化中探析》，《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451页。

[2] 张荣德主编：《吴昌硕翰墨珍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3] 按，关于海上的生活成本，可参考1898年6月28日《申报》一篇名为《居沪之不易》的文章：“就中户而谕，一家五六人，……每月计之已需钱十二三千矣，加以房价数元，即有二十元月俸者，除米薪房价三者之外，其所余已微之又微，等而上者可类推，降而下者更无论矣。”

[4] 肖宗志：《晚清地方候补文官的职事收入及其后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81—85页。

[5]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361页。

[6] 陈振濂编：《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7] 按，郑逸梅对此事有记载，称：“当时昌硕敦促子云到上海鬻艺，是含试探性质的，先锋队去了很顺利，他老人家的大军也就长驱直入了。”见郑逸梅：《郑逸梅选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清时期很多像吴昌硕一样的捐纳者并非都如此幸运，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寒酸尉”也没有出头之日，甚至有不堪重负、自寻短见者。例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描绘了一个叫陈仲眉的候补知县，“吃尽当光，穷的不得了最后上吊而死”的情节^[1]，作为晚清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个桥段是有其现实依据的。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也记载了不少反映当时捐纳者报捐前后心理落差例子：

……满望一二年之后，侥幸得一差委，便可将从前借贷之款，稍稍清偿。孰意到省之后，旅况凄凉，生意落寞。除朔望衙参外，未能一见大宪之面。始犹强自慰藉，以为时运未至，今日困顿，尚可望他日顺利。洎乎年复一年，头衔误我，手版羞人。宿债未清，新道又积，衣归质库，仆隶豪门。当此之时，殊有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之势。此诚策名委质时，所料不到此者也。^[2]

因此与大部分候补无望者相比，吴昌硕算是运气好的。可惜他最终捐到了县令却并未接任“腴缺”，清偿借贷的诺言难以兑现，这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所以上述材料说“头衔误我，手版羞人”，这句话用于形容吴昌硕捐官前后的心理落差可谓贴切。更糟糕的是，不仅做官赚钱还债无望，为了维持官场体面还得有大笔开销，所谓“宿债未清，新道又积”、“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吴昌硕不正遇到了这样的尴尬吗？他的抉择是辞掉“一月安东令”，在旁人看来是有点“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范，而此中甘苦自不便向外人道也。

说回到“寒酸尉”问题，也与吴昌硕最终寓沪鬻艺不无关系。他一面在官场把自己扮作“寒酸尉”，另一面又把《寒酸尉像》拿来当作与海上名家和艺坛名流交际的社交“名片”，以期打开海上书画市场。过去不少学者对“寒酸尉”存在误读，认为此图代表了吴昌硕的政治牢骚，那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寒酸尉像》在其鬻艺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市场推广作用。赖毓芝在研究《寒酸尉像》时指出：

吴昌硕本人或上海的艺文界显然对吴氏之功名非常重视。翻开《申报》，其对晚清时期吴昌硕的称谓，从来不是书家、金石家或画家，而是“江苏候补县吴昌硕明府”（《申报》1903年3月30日），或是“义渡局委员吴昌硕明府”等（《申报》1904年10月24日、1906年2月24日），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出现“吴昌硕”。……至于画家吴昌硕称谓的出现，甚至要晚到1920年代以后才渐形普遍（《申报》1920年11月17日）。^[3]

晚清民国时期，海上鬻艺者多以功名或社会身份自矜，这是一种市场策略。吴昌硕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出现的，随着艺术声誉的与日俱增，到了民国时期才真正获得了艺苑巨擘的定位。换言之，吴昌硕以“寒酸尉”的形象介入市场，其主要目的并非自嘲或发表对官场的不满，而是抓

[1] （清）吴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

[2] 《论课吏》，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第248—249页。

[3]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15页。

住了海上商业文化中人们最普遍的心理——功名在鬻艺市场中是个很好的噱头和卖点。实际上民国时期不少前清遗老、社会名流来沪鬻艺都把前朝功名和身世背景当成一块金字招牌，如李瑞清在民初来海上卖字时市场没落，有人告诉他几条卖字的“规矩”，第一条便是“有官帽”，并强调说：“你当过宁藩司，不但有官帽，且官很大……”^[1]事实证明李瑞清的官帽的确好用，当他在海上打开市场以后，还邀请了前清二品大员曾熙一起“偷活海上”^[2]，曾熙的市场也随之风生水起。所以赖毓芝质疑“寒酸尉”形象解读时说：“（寒酸尉）是否真如吴昌硕所言之卑微？考虑当时上海的时空背景，若以家富收藏、曾经于1909年号召成立上海豫园书画善会、在上海艺坛颇有声望的高邕（1850—1921）为例，其官职也不过是江苏县丞。”^[3]这个反诘是相当有力的。巧合的是，就在作《寒酸尉像》的前一年，任伯年也为高邕作了一幅名为“书丐图”的画像，同样是把县丞高邕描述为指仗砚田、混迹市井的落魄文人，“然而透过自我嘲弄后，画家不得不卖文为生之窘境似乎不再是一项禁忌，反而变成一个在笑声过程中被接纳了的事实。……笑声不再只是为了削减卖画的尴尬，同时也是标榜画家的文人认同。”^[4]晚清民国时期，商业文化中对功名的认同竟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苏州旧闻·晚清社会新闻图录》中一则题为“不堪回首”的文字，在记录一个佐贰沦落为车夫之事时，第一句话便说：“佐贰杂职本是朝廷不甚爱惜之官，然自其本身视之则固俨然一命之荣，不与齐民为伍亦。”^[5]由此便不难揣测吴昌硕把自己“寒酸尉”的形象公之于众的心态了。“寒酸尉”在官场自然是微不足道，然在十里洋场的海上，由于商业文化中仍存有权力崇拜，因此“寒酸尉像”非但不是自嘲，反而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标榜，所以吴昌硕在篆刻和诗文中反复提到这一形象也便不足为怪了^[6]。

还需要说明的是，“寒酸尉”并非任伯年给吴昌硕所画的唯一画像。就在作《寒酸尉像》的前两年，吴昌硕还请任伯年画过《饥看天图》，其自跋与《寒酸尉像》如出一辙：

造物本爱我，堕地为丈夫。昂昂七尺躯，炯炯双青庐。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频岁涉江海，面目风尘枯。深抱固穷节，豁达忘嗟呼。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书。卖书犹卖田，残阙皆膏腴。我母咬菜根，弄孙堂上娱。我妻炊糜粝，瓮中无斗糒。故人非绝交，到门不降舆。见笑道旁谁？屠贩鬻鬚须。闭门自斟酌，天地本蘧庐。日月照我颜，云雾牵我裾。信天鸟知命，人岂鸟不如？看天且听天，愿天鉴我愚。海内谷不熟，谁绘流民图，天心如见怜，两粟三辅区。贱子饥亦待，负手游唐虞。^[7]

此诗采用自嘲的方式，叙述了吴昌硕听鼓辕门的卑微落魄的候补生涯。其中母亲饥至吃菜根，妻子窘到以门枢为柴的情景令人感动，这种以贫贱自居的落魄文人风范，在鬻艺市场中也颇为流

[1] 引自陈传席：《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2] 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336页。

[3]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15页。

[4] 赵润田：《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第15页。

[5] 王稼句点校：《苏州旧闻》，古吴轩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6] 如吴昌硕1889年刻有“寒酸尉印”，见〔日〕小林斗盦编：《篆刻全集》第8集，日本二玄社1981年版，第92页。

[7] 见侯开嘉：《关于吴昌硕六十岁前后变法种种》，《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60页。

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昌硕的画像之举是带有市场目的的。经查1888年前后吴经常请任为其画像，仅1883到1893年十年间便有9幅之多，其用意何在呢？如果联系到1899年吴昌硕辞官，1911年他最终寓沪鬻艺便不难理解了。结合前面分析我们发现，吴昌硕的捐官、辞官以及“寒酸尉像”的推出皆成为推动其市场宣传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他捐官尚带有较强功名色彩的话，则《寒酸尉像》便更多体现为一种市场行为。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平面媒体的兴起，肖像画日益成为鬻艺者市场宣传与推广的重要手段。任伯年以其高超的人物画技巧而备受青睐^[1]，不少书画家皆请其作画以示渲染。如1879年任伯年便为陈鸿寿及其女陈慧娟作《授诗图》，该图经过《申报》的大肆宣传，“使得通常只流传于文人朋友间半私密的个人肖像画，有了全新的公众性与影响力。”^[2]所以吴昌硕在19世纪末年频繁请任伯年为其画像，实际上是他为打开海上书画市场而进行的系列行动之一，这也恰恰是包括任伯年在内的许多谋食海上者的通行做法。

结束语

民国以来，吴昌硕捐官、辞官问题成了口口相传的谈资，大家甚至不太在意其中原委曲折，以至于把吴昌硕辞官简单地解读为其蓬蒿阔达、不意仕进的文人秉性使然，这是一种过度阐释。实际上吴昌硕的辞官行为与其晚年拮据的经济生活和晚清捐纳制度的泛滥有很大关系。吴昌硕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放弃仕途的念想，这在其墓志铭、行述或子孙的回忆录里都有显示。然晚清腐败的捐纳制度并未给他这样的穷书生以足够的生存空间，当他发现仕途非但不能施展抱负，且生计都成问题，数千银两的纳捐债务更无法如期偿还时，仕隐权衡的矛盾最终使其选择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寒酸的官场生涯便成为其鬻艺治生的宣传噱头。无论是辞官当年所刻的“一月安东令”，还是辞官十年后所刻的“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皆成为其鬻艺生涯的一种标榜。

（作者系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 按，据《淞南梦影录》载，任伯年作画“亦亦如生”，“虽仅有半面缘者，一见即能辨认。”见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2] Roberta Wue, The Profits of Philanthropy: Relief Aid, Shenbao, and the Art World in Later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Late Imperial China, 25: 1 (2004), pp.187—211.